

兰州市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特征 及动力机制

高 翔, 鱼腾飞, 宋相奎, 程慧波

(兰州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兰州 730000)

摘 要: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在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 由于加入了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与民族意识的变量, 其空间行为过程显得更复杂、更丰富。本文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 研究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空间行为特征及驱动机制, 得出其空间行为特征表现为: ①来源地构成较为集中、单一, 主要以周边民族地区为主; ②来源地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 交通牵引使该结构发生分异; ③居住地选择具有“围寺而居, 围寺而作”的特点, 总体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空间结构。进一步运用系统动力学的观点从两种“维度”、两种“机制”、两个“方面”构架了“三位一体”的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动力机制模型, 并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关 键 词: 回族与东乡族; 空间行为; 动力机制; 兰州市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进入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1]。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在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 由于加入了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与民族意识的变量, 其空间行为过程显得更复杂、更丰富, 成为当前城市面临的焦点问题^[2-5]。尽管部分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6-11], 但针对少数民族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特殊复杂空间行为过程的研究工作尚显滞后^[12-13], 从多学科的视角出发进行民族迁移者空间行为的系统综合研究成果还没有。本文基于 GIS 空间分析方法, 通过对兰州市少数民族集中区发放问卷与面谈式收集基础资料, 分析兰州市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特征并探讨了其动力机制。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不仅对他们自身的发展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且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我国今后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建设, 甚至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2 研究概述

2.1 研究区概况

兰州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城市之一, 至 2007 年底, 全市总人口 314 万人, 其中少数

民族有 37 个之多, 人口约 11.27 万人, 占全市总人口的 3.6%。全市少数民族人口中, 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东乡族人口分别占 76.5% 和 3.8%, 两者合计占 80.3%。因此, 本文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 来考察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过程。

2.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2.1 数据来源

兰州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布表现出我国各地区少数民族分布所共有的“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特点, 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分布主要集中于几个特殊的地点。依据普适性和区域特性相结合的原则, 选取流动人口居多的西固区福利路, 安宁区培黎广场, 七里河区小西湖、西关十字及上西园, 城关区东部市场 6 处地点进行调查(图 1)。于 2009 年 7-9 月, 采用发放问卷与面谈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 总计发放问卷 70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512 份, 回收有效率 73.14%。本次调查以少数民族流迁人口为主, 有效问卷中少数民族 340 份, 占 66.4%, 汉族 172 份, 占 33.6%。

2.2.2 研究方法

GIS 方法是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空间结构的最主要方法之一, 已在社会、经济领域有广泛应用。尤其在人口学领域的人口空间分布模式、空间结构等研究中已逐渐成熟, 如张岸^[14]等利用 GIS 研究了深圳

收稿日期: 2009-10; 修订日期: 2010-01。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01048);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9YJA840017)。

作者简介: 高翔(1974-), 男, 山东单县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城市化方面研究。E-mail: xgao@lzu.edu.cn

市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汪洋^[15]等利用 GIS 对重庆市社会经济系统空间结构的研究等。本文综合运用 GIS 的各种空间分析技术及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对兰州市少数民族集中区发放问卷与面谈式收集基础资料,对兰州市回族、东乡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3 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特征

3.1 来源地构成较为集中、单一,主要以周边民族地区为主

调查结果显示:兰州市回族、东乡族来自省外的被调查人数仅占总调查人口的 8%,包括:北京、江西、新疆、陕西、云南、宁夏、青海、河南等省市。甘肃省内占 92%,其中临夏回族自治州及天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合占 56.47%(图 2)。以上表明:兰州市回族、东乡族来源地相对集中,主要以兰州市周边

民族地区为主,临夏州及天水张家川县为两大主要的迁出中心。

临夏回族自治州多民族、多宗教共存,有 22 个民族共 196 万人口,回族人口约 61 万。临夏州离兰州市不足 100 km,以 213 国道及县乡道与兰州相连,交通便利,是古丝绸之路的南道,素来以商贸繁荣而闻名,有“西北旱码头”之美誉。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东有温州,西有河州(临夏)”的著名论断^[16]。临夏回族群众长期以来形成浓厚的商品意识,经商做买卖是许多家户的传统行业,使得临夏州成为回民流动较大的地区之一。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是陇东南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2007 年底总人口 30.6 万,其中回族人口 22 万,占总人口的 69.3%;农业人口 26.2 万,占 85.62%。全县人均 GDP 为 2728 元/人,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23.92%^[17]。可见,这种巨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促使张家川回族人口向外迁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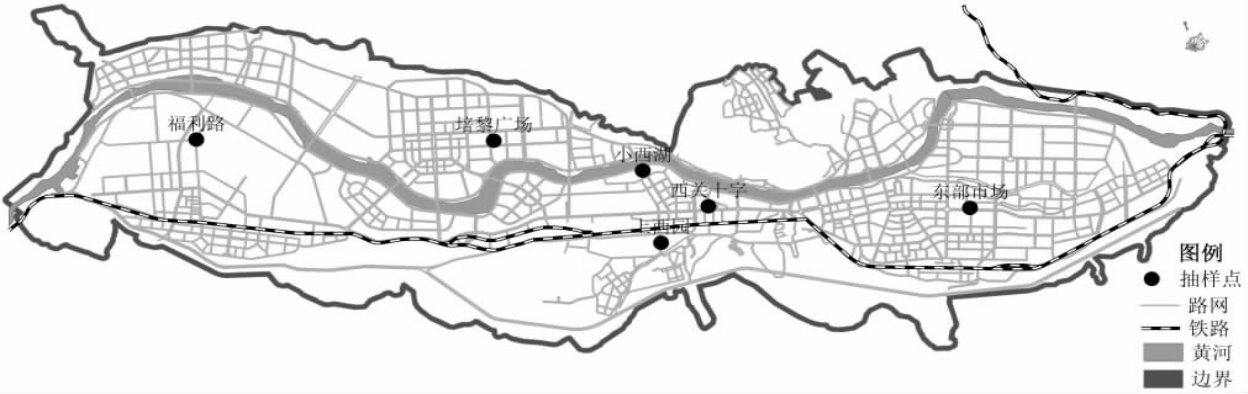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区调查样点分布示意图

Fig.1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vestigated samples in the study are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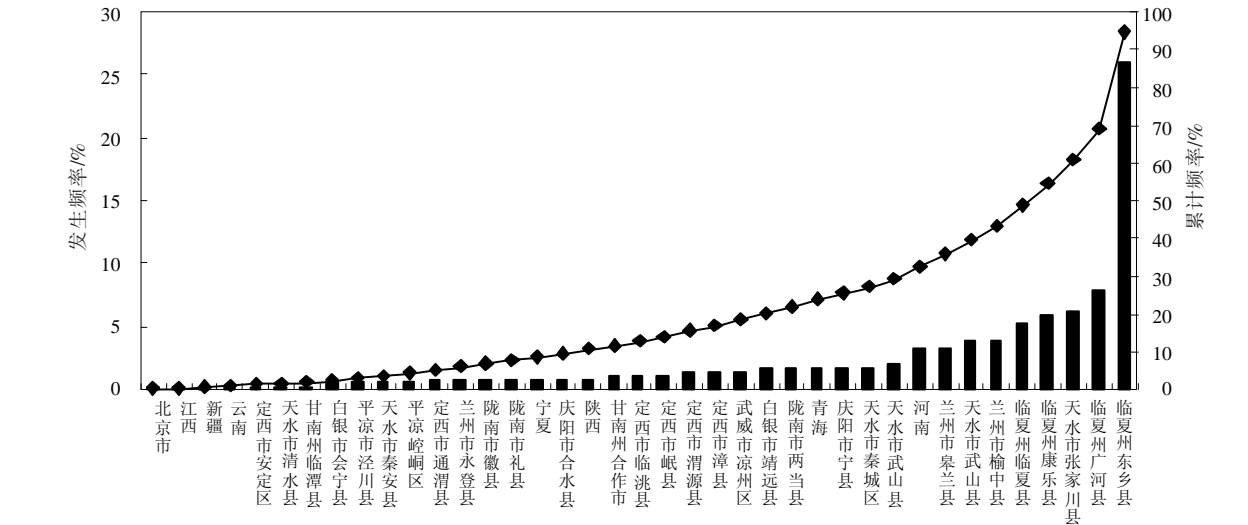


图 2 兰州市少数民族县域来源地构成^[1]

Fig.2 The composition of minorities in Lanzhou city coming from different counties

从而成为兰州市回族流动人口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可以看出:周边民族地区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巨大的人口压力提供了人口迁移的外推力,加之交通便利、距离城市较近、迁移成本较低以及回族群众长期以来形成的经商意识提供了强大的引力,使得两地成为兰州市回族、东乡族流迁人口的迁出中心。

3.2 具有典型的双“核心—边缘”结构,交通牵引使该结构发生分异

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来源地构成表明:临夏回族自治州及天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是兰州市少数民族流迁人口 2 大主要来源地。那么来源地空间分布模式究竟是随机的、均匀的,还是聚集的?为进一步分析来源地空间结构,将调查到的数据以来源地发生频率^①为属性连接到 GIS 空间数据中,采用 Kinging 插值得到不同来源地发生频率的分级图(图 3a),并利用 GIS 的核密度估计法(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KDE) 分析不同来源地发生频率的核密度估计值(图 3b)。图 3 显示:少数民族迁移来源地空间分布具有典型的双“核心—边缘”的分布模式。“核心”指以临夏州、天水张家川为中心的聚集特征,“边缘”指距离中心越远迁移发生频率衰减的特征,这也正印证了兰州市回族、东乡族来源地构成较为集中、单一的结论。

英国统计学家 Ravenstin 提出,人口迁移率与迁移距离成反比,大多数人口迁移都是短距离的迁移;有研究显示:距离与人口流动的规模呈反比^[18]。同

时为进一步反映这种空间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将主要交通线及河流等牵引要素与不同来源地发生频率的分级图相叠加(图 3),可以发现沿交通线呈“串珠”状分布也是其主要的特点之一。这可以用距离成本加以解释:距离交通线越近,迁移成本越低;反之亦然。这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流迁人口与传统的“人口迁移率与迁移距离成反比”有共同之处,在小尺度上遵循这一原理;但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人口的远距离迁移在交通引导下已变为可能,而并非仅仅局限于城市周边。说明这种“大分散,小聚集”的地域结构正在面对来自城市化的考验与冲击,同时民族文化遗产、创新、发展所必须的社会结构也正在发生重组。

3.3 具有“围寺而居,围寺而作”的特点,呈“大杂居、小聚居”的空间结构

调查结果显示,有 40% 的人进入兰州后选择“本民族人口集中的小区”作为居住地,46.18% 的人选择“各民族杂居的小区”,还有 13.82% 的人“不清楚”;对于进城后自己最适合的工作,有 54.64% 的人选择“清真餐饮及食品加工”,有 32.99% 的人选择“商品零售”,有 12.37% 的人选择“建筑、维修”。可以认为:居住地选择上民族杂居与聚居比例相当,杂居与聚居共同存在于“空间局域谱”^[19]中。

为进一步分析居住地的地缘结构,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20],笔者认为兰州市回族、东乡族流迁人口在居住点空间选择上会以距离民族活动场所较近、族群人口较多、聚居程度较高为首要目标。同时,考虑到少数民族因有着极强的经商观念、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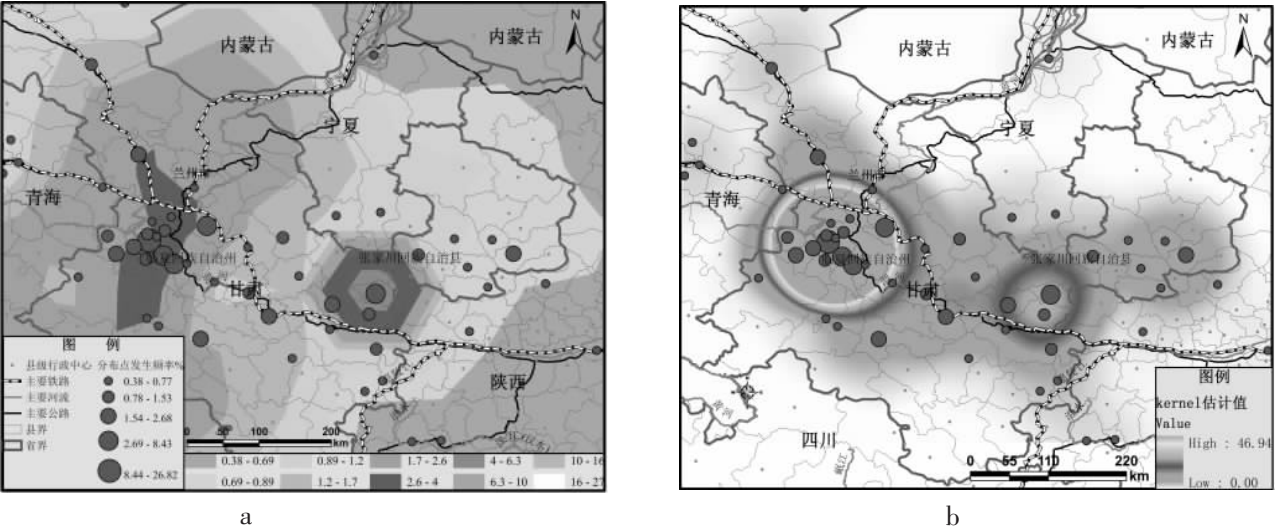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来源地发生频率的分级结构图(a)和 Kernel 估计(b)
Fig.3 The frequency obtained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 classification chart; (b) KDE

①发生频率为各迁出地人口占总流迁人口的比重。

意识,独特的民族宗教文化与饮食、婚丧、居住习俗,加之清真餐饮在全市饮食行业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现实,调查了兰州市主要的清真寺^②及清真餐饮业^③空间分布^[21](图4)。图4显示:兰州市主要清真寺与餐饮业聚集呈对应分布和正相关关系,两者均呈聚集分布,餐饮业以主要清真寺为核心向中心聚集,表现出自市中心向市郊区递减的走势,具有“围寺而居,围寺而作”的特点,同时为满足城市生存与适应需要,部分餐饮业脱离“主体”而呈分散分布,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地缘结构。这一结构主要受民族意识、民族宗教文化、民族习俗及族缘关系等因素影响,同时自身的经济、教育、技能水平以及社会的制度、政策等因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4 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动力机制探讨

人口流迁空间行为过程是内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由于地域差异、社会二元结构等因素引起的城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并由此产生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巨大的梯度力,形成大规模、不稳定的乡城人口流动(劳动力转移),即所谓的“民工潮”现象^[22];另一方面,流迁人口又因自身素质、社会认知、城乡壁垒政策(如户籍制度)等因素受到一定的制约,如近些年出现的“民工荒”。这种驱动力和制动力同时起作用,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4.1 驱动机制分析

人口迁移是人类对空间差异性的一个重要反应,也是塑造差异性的主要因素,它具有深刻的原因和过程^[23-24]。迁移空间行为发生的基本因素是推力和拉力,起因于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诸多方面。应该说推力和拉力是同时起作用的,但往往可以依据各方出现的先后顺序来区分迁移是由推力还由有拉力所主导^[25]。

4.1.1 人口迁移的“推力”分析

“推力”是指原居住地不好的条件,包括人口过多、恶劣的气候条件、居住条件不好、缺乏就业机会和宗教迫害等;迁移成本高低^④、欲迁居的人的身体状况、家庭纽带的强弱等都会最终影响迁移空间行为决策;法律及制度(如户籍制度)的因素也会起作用。但总的来看,人口流动的主动因是经济因素^[26]。

人均GDP可以很好地反映一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生活状况,可以揭示人口迁出地对人口迁移的“推力”,正如前述,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与大城市巨大的经济梯度使得人口迁移规模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为印证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此以县域为统计单元,绘制了甘肃省内人口迁出地人口迁移发生频率与县域人均GDP的散点图(图5)。两者大致呈负相关关系,但回归方程的 R^2 并不显著,无法用简单的回归方程进行刻画,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迁移的推力之一,但两者具有较复



图4 兰州市主要清真寺、清真餐饮业空间分布及 kernel 估计

Fig.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KDE of the main mosques and Muslim's food in Lanzhou city

②主要包括兰州市 20 个比较大的清真寺,分别为:西关清真大寺、金城关水上清真寺、和平清真寺、土门墩清真寺、安宁清真寺、沙井驿清真寺、西固清真寺、莲花池清真寺、西湖大清真寺、硷沟沿清真寺、上西园清真寺、工林路清真寺、徐家湾清真寺、靖远路清真寺、绣河沿清真寺、南关清真大寺、榆中街清真寺、新华巷清真大寺、东岗镇清真寺、耿家庄清真寺、桃树坪清真寺。

③清真餐饮以街道为单元进行统计,以街道餐饮店个数为发生频率。

④迁移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和物质成本。一般而言,将迁移预期收益减去迁移成本的净收益作为人口迁移的拉力,较低的迁移成本也成为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杂的关系,同时也受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

4.1.2 拉力分析

“拉”力是指吸引移民迁居别地的因素,包括迁入地丰富的就业机会、适宜的气候、吸引人的生活方式、廉价的土地和政治自由等。对于兰州市回族、东乡族流迁人口的拉力在此更多强调民族意识、民族传统、民族认同等族缘关系对流迁人口的影响。

据调查,兰州市 5 个区有清真寺和拱北等伊斯兰教活动场所 83 处,其中回族较多的城关区和七里河区共 66 座;较多宗教场所的存在不仅满足了城市少数民族从事宗教活动的需要,而且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了宗教生活保障,成为其流入西北大城市的又一重要吸引力。对于“若您信仰伊斯兰教,您每周都去清真寺做主麻吗?”的回答,在调查的 204 名男性中,有 96 人选择“每周去”,占总数的 41.03%;有 69 人选择“偶尔去”,占总数的 29.48%,其他的选择“不去”。可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不仅主观上有进行宗教生活的愿望,而且客观上有从事宗教活动的实践,表明宗教生活的便利性在此拉动了迁移行为的发生。

马戎^[27]指出:“(人口迁移)一般会向自己所属族群人口较多、聚居程度较高的地点迁移,以求得族群和文化归属感和语言习俗方面的便利”,“迁移后会自发形成本族人相对聚居的小社区,使本族的生活习俗、宗教生活得以保持,生活上便于互助,也较易于集体争取自身合法权益。”

兰州是丝绸之路甘肃段中路的重要驿站,最早在唐宋时期就有穆斯林商贾落足于此,经元、明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至清已基本形成“围寺而居”的分布格局,如绣河沿、桥门巷、海家滩、陈官营等回族聚居区^[28]。1929 年甘肃发生大灾荒,加之后来爆发的抗日战争,中原地区及周边大量的回族人口流入兰州,形成了 30 多个寺坊,这种寺坊格局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前,期间大量的清真寺被拆毁或占用。至 1999 年底,在兰州市共有清真寺 89 座,拱北 21 处,至此历经长期社会变迁、文化变革形成了一个以回族为主体的穆斯林族群。正是这种历史时期形成的族缘关系,使得兰州市与周边民族地区之间在民族、宗教、生活习惯等方面基本一致,文

化、传统上的类同性极大地拉近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的心理距离,使其产生对城市的认同感,吸引了周边大批穆斯林进入城市。

西方人口学家 Everetts Lee 认为,人口迁移规模与地区间及人口间的异质性程度成正相关,即地区间的异质性越高,迁移规模就越大;人口间的异质性越高,迁移规模也越大。而汤夺先^[12]认为:对于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来说,在民族宗教方面的同质性成为影响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的重要“拉力”。究竟是地区或人口之间的“异质”还是“同质”成为少数民族人口流迁的拉力?本文对此做了相关的调查,在对问卷“您进城后自己的感受与您之前听到的或想到的又差距吗?”的回答中:有 165 人(占 48.53%)选择“基本一致,可以接受”,有 117 人(占 34.41%)选择“有差距,但可以适应”,有 28 人(8.24%)选择“差距较大,适应比较困难”,有 24 人(占 7.06%)选择“完全一致”,有 6 人(占 1.76%)选择“差距太大,无法适应”。可见,正是大城市与周边地区的民族同质性促动了少数民族人口空间迁移行为的发生。正如马戎所说,民族同质性加强了族群文化的认同感,缩短了民族、宗教、生活习惯的心理距离,从而成为少数民族人口迁移行为发生的重要“拉力”^[27]。

综上所述,在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的驱动机制中,除民族地区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差等推力以及城市条件较好、城市之间交通通达性好等拉力外,宗教生活的便利性以及大城市与周边民族地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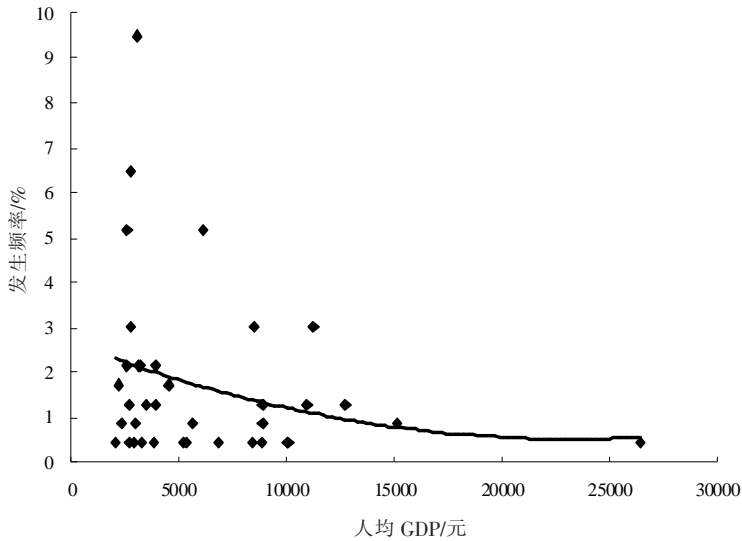


图 5 来源地发生频率与人均 GDP 散点图

Fig.5 Scatters between the frequency of different sources and per capita GDP

间民族成份的同质性为他们提供了一种相对熟悉的环境,成为其选择流入地权重较高的参考系数与重要的外部拉力。

4.2 制动机制分析

对于制动机制的分析,结合兰州市回族、东乡族流迁人口的特点,主要从民族因素、自身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制度因素等方面系统分析这些因素对兰州市回族、东乡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的阻碍。

(1) 民族因素 迁入地与迁出地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价值观念、教派等各方面的异质性对其空间迁移行为具有重要的阻碍作用。按照人类学的理论,不同族群之间的了解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形成对于他文化的宽容与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族群的自我认同与对他文化的认知成为族际交流的核心,成为影响民族流迁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本次调查显示:对“本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的了解程度”的回答:42.51%表示“比较了解”、34.73%表示“非常了解”、20.66%表示“一般”及 2.1%表示“不了解”;对“社会发展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程度”的回答:39.39%表示“比较明显”、32.42%表示“一般”、22.12%表示“非常明显”及 6.06%表示“不明显”。可以看出在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及对外文化入侵的抵触成为影响其空间行为的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民族压迫与歧视对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亦产生过重要作用。如清朝时期对回族采取的“毋令聚居,毋近汉人,毋居城市”的民族歧视与政策^[28]。长期以来,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民族上与汉族融而未和、在文化上与儒教文化同而未化的现象,随着统治政策的失当与社会环境的压迫,汉回关系摩擦引发的流血悲剧时有发生,导致对伊斯兰文化的偏见与误解长期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意识中。一方面,由于部分少数民族给人留下的不好印象^[29](如吸毒贩毒、盗窃等),城市的部分汉族群众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抱有偏见,对其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时会对歧视他们的人采取“报复”行为,其结果不但使双方都遭受损失,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境况也更加恶化。从自身因素来看,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依附性”^[30]发展模式培育了其‘等、靠、要’的消极心理和行为方式,造成内在生长力与外在“扩散—供给”模式出现了某种断裂与失衡,使得民族地区人口的迁

居及社会发展变得遥远而渺茫,甚至不可能。正如费孝通指出:“少数民族比较容易满足比较简单低下的生活水平,解放后消灭了剥削压迫,关上门过自己的田园生活,精神状态是宁静的、自足的。”^[31]这种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心理状态对人口流迁乃至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再者,本次调查显示兰州市回族、东乡族具有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技能水平不高及经济收入低的特点,加上农村长期以来形成的自给自足、封锁内向的心理、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等,出现少数民族文化心态脱序情形^[32],对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亦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

(2) 社会因素 对于流迁人口的社会排斥来自这样一个认识:外来的农村劳动力抢了城里人的“饭碗”。作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途径的劳动力流动,似乎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形成了直接的矛盾,对于这些“不速之客”的种种责难,似乎不是空穴来风。本次调查显示:在对“当地人对外来打工人员有歧视”的回答中,有 189 人(占 55.59%)表示“符合”,131 人(占 38.53%)表示“不符合”,20 人(占 5.88%)表示“不清楚”。来自城市人群的偏见与歧视直接导致少数民族流迁人口文化、心理的极大不适应,在对“进入城市生活您最大的不适应是?”的回答中,有 127 人(占 37.35%)表示“被歧视,与城里人很难交朋友”,103 人(占 31.18%)表示“没有安全感(如担心自己未来的工作、生活)”,48 人(占 14.12%)表示“其他”,30 人(占 8.82%)表示“被剥夺(如衣、食、住、行昂贵)”,29 人(占 8.53%)表示“觉得自己是外乡人,不适应城市生活”。毋庸置疑,把城市的高失业率现象归咎于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竞争确实有失公正,但是这种影响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正在深化^[33]。

(3) 制度因素 中国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直实行非常严格的户籍管制,而且在 80 年代之前对于人口流动也有严格的管理办法,所以少数民族迁移进城是非常困难的。8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及城乡户籍制度松动,大量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涌入城市,城市管理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恐慌,纷纷出台限制、约束甚至是排斥性的政策。这种“隐形户籍墙”的结果是“市民”与“农民”的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本次调查显示:对“您认为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吗?”的问题,有 20.9%的人选择“很不完善,形式不容乐观”,72.24%的人选择“不完

善,还需要大力改进”,仅有 6.87%的人认为“很完善了”。可以认为城市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以及农村医疗、土地补贴、社会保险等的逐步完善阻碍了人口的流迁,出现近年来的“民工荒”就不足为奇。同时,在就业制度上有的就业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少数民族外来人员存在歧视现象,一方面很多就业机构和单位不愿意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程度比较低,缺乏工作技能,也难以获得就业机会。

良警宇对北京牛街回民社区的研究得出结论,“影响社区变迁历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政策和国家力量的干预,甚至这种干预成为决定该地区生存或死亡的前提”^[20];Glandeny^[34]也表示过类似观点。制度因素对社区变迁历程的影响是对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的缩影,其主要来源于迁出地与迁入地双方,诸如户籍制度、农村联产承包制以及近年来采取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粮食直补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等一系列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具有较大吸引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流迁人口空间行为决策。加之兰州市回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在城市生活的不适应,极大地阻碍了少数民族人口的迁入甚至部分“回流”。本次调查显示:在谈到对未来生活的想法时,有 95 人(占 27.94%)选择“现在生活不好,不愿意一直生活在兰州”,有 183 人(占 53.82%)选择“一般”,有 60 人(占 18.24%)选择“现在生活很好,愿意一直生活在兰州”。虽不能将此全部归结于制度因素,但从中

也可以看出,制度因素确实是原因之一。

4.3 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动力机制探讨

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驱动和制动两种机制共同作用,时间与空间两种维度相互演替,这种作用与演替来源于农村与城市两个方面。鉴于此,笔者从两种“维度”、两种“机制”、两个“方面”构架了“三位一体”的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模型(图 6)。

4.3.1 两种“机制”

指驱动机制与制动机制共同作用于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过程。

(1) 驱动机制表现在空间迁移行为受迁出地的“推力”及迁入地的“拉力”两个方面。迁出地的“推力”主要包括身体状况、家庭纽带的强弱等自身因素,地区分异引起的地理环境、人口、经济梯度及迁移成本低等经济因素,以及缺乏就业机会、法律、制度及宗教迫害等社会因素;迁入地的“拉力”除城市条件较好、城市之间交通通达性好等拉力外,宗教生活的便利性以及大城市与周边民族地区之间民族成份的同质性亦是重要的外部拉力。

(2) 制动机制主要包括迁入地与迁出地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价值观念、教派等各方面的异质性等民族因素;迁移者本身的低地文化水平、随遇而安、封锁内向的心理状况、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等内部因素;迁入地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与不平等的待遇等社会因素;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制度障碍、就业障碍等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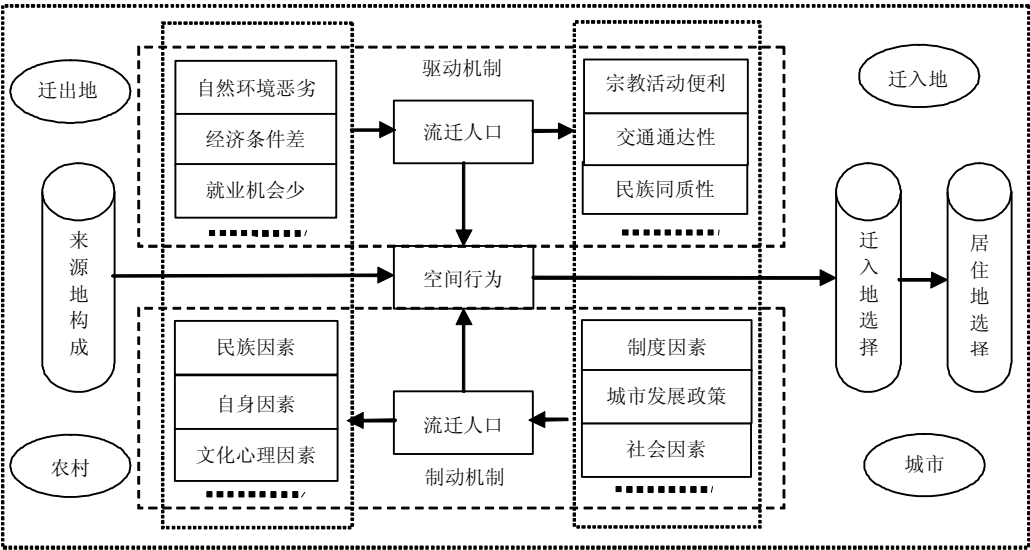


图 6 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动力机制

Fig.6 Spatial behavior mechanism of the the minority floating population

4.3.2 两种“维度”

指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在迁入地与迁出地的空间维度以及空间行为演化的时间维度。

(1) 空间维度从宏观上讲是迁出地与迁入地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及模式,是动力机制作用下形成的空间结构,比如迁入地单一的来源结构及“核心—边缘”分布结构,因具有明显的民族“烙印”而表现出与一般农民工的差异。从微观上来讲是在迁入地的居住形态,相应的地缘结构、社缘结构以及在此之上建立的“五维一体”^[20]的社会结构。

(2) 时间维度是流迁人口在动力机制作用下的空间行为过程,是空间行为的路径及行为模式,目前对于这部分的研究明显不足,这将是笔者未来探索的方向,将另文叙述。

4.3.3 两个“方面”

指城市与农村族群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经济发展等一系列社会范畴。对于这部分的研究国内外已有大量的著作,在此不再一一详述。

5 结论及展望

少数民族流迁人口在接受城市化和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由于加入了民族文化、民族传统与民族意识的变量,其空间行为过程显得更复杂、更丰富。本文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研究了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空间行为特征及驱动机制,其空间行为特征表现为:①来源地构成较为集中、单一,主要以周边民族地区为主;②来源地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交通牵引使该结构发生分异;③居住地选择具有“围寺而居,围寺而作”的特点,呈“大杂居、小聚居”的地缘结构。并运用系统动力学的观点从两种“机制”、两种“维度”、两个“方面”构架了“三位一体”的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动力机制模型。

作为目前民族地理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应用多学科理论及方法探讨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的空间行为特征及驱动机制,对于促进城市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城市规划、人口管理及社区建设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于其空间行为特征及动力机制的探讨也存在一些不足与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对时间维度下的空间行为过程的研究明显不足,这也是目前社会和学术界需要密切关注的焦点及今后需要深入的地方。

参考文献

- [1] 张善余,曾明星.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与人口迁移形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民族研究,2005(1):17-18.
- [2] 高翔,王乃昂,程慧波.回族流迁人口城市适应过程研究的理论探讨.西北人口,2009,30(4):105-107.
- [3] Shen J F. Internal migration and regional population dynamics in China. Progress in Planning, 1996, 45: 123-188.
- [4] Otterstrom S M. Trends in national and regional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1790 to 1990: From the frontier to the urban transformation.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2001, 38(3): 393-407.
- [5] Fan C C.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90 and 2000 census comparisons.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05, 57(2): 295-311.
- [6] 朱传耿,马荣华,甄峰,等.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空间结构.人文地理,2002,17(1):65-69.
- [7] 张继焦.城市的适应:迁移者的就业与创业.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8] 柴彦威,沈洁.基于活动分析法的人类空间行为研究.地理科学,2008,28(5):594-601.
- [9] 姚华松,许学强,薛德升.广州流动人口特征及空间差异分析.热带地理,2008,28(3):259-264.
- [10] 蒋莲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及应对原则.社会科学,2006(9):100-105.
- [11] 孙峰华,李世泰,杨爱荣,等.2005年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地理,2006,26(6):974-979.
- [12] 汤夺先.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若干特点论析: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民族研究,2006(1):31-42.
- [13] Ragnar N. Problems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14] 张岸,齐清文.基于GIS的城市内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以深圳市为例.地理科学进展,2007,26(1):95-105.
- [15] 汪洋,赵万民.社会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分析的GEO-IN-FO模式:重庆市实证研究.地理科学,2008,28(6):729-735.
- [16] 费孝通.费孝通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 [17] 甘肃年鉴编委会编.甘肃省统计年鉴(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 [18] 魏津生,盛郎,陶鹰.中国流动人口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4-46.
- [19] 牛文元.理论地理学.北京:商务出版社,1992:69-71.
- [20] 杨文炯.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1] 杨学农, 王正儒. 清真在我身边.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9: 261-268.

[22] 蔡昉. 中国流动人口问题.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114-116.

[23] Fellmann J D, Getis A, Getis J. Human Geography. Boston: McGraw-Hill, 2003.

[24] de Blij H J, Murphy A B, Fouberg E H . Human Geography: People, Place, and Cul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07.

[25] 梁进社. 地理学的十四大原理. 地理科学, 2009, 29(3): 307-318.

[26] 朱传耿, 顾朝林, 张伟.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人口学刊, 2002, 132(2): 9-14.

[27] 马戎. 民族社会学: 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338-339.

[28] 马通. 甘肃回族志,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94.

[29] 杨建新. 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201-208.

[30] 马戎. 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85-86.

[31] 张儒, 李晓晖. 费孝通谈缩小差距. 中国民族, 1986(7): 1.

[32] 张继焦. 论我国南方民族文化的类型、层次与变迁. 贵州民族研究, 1997(2): 21-27.

[33] The Wrold Bank. China: Reform of State-Owened Enterprises. China and Mongolia Department,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Report No.14924-CHA. 1996.

[34] Glandeny D C.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patial Behavior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Minority Migr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Hui and Dongxiang Ethnic Groups, Lanzhou City

GAO Xiang, YU Tengfei, SONG Xiangkui, CHENG Huibo
(School of Earth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patial behavior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ethnic migrations based on extensiv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taking Hui and Dongxiang ethnic groups in Lanzhou as examples. It is concluded that: (1) The source of minority migration in Lanzhou has a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patial aggregation. Linxia Hui Autonomous Prefecture and Zhangjiachuan Hui Autonomous County are the main sources, accounting for 56.47% of the total. (2)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ving around the temple, working around the temple”. The spatial living pattern of “big gethering and small groups” has been formed to meet the needs of survival and adaptation in urban areas. (3) In the driving forces of minority migration, there are “the pushing forces” such as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gradient caused by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pulling forces” such as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traffic accessibility, the homogeneity of ethnic group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convenience of religious activities.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an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ethnic relations, urban planning, population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Hui and Dongxiang ethnic groups; spatial behavior; driving mechanism; Lanzhou city

本文引用格式:
高翔, 鱼腾飞, 宋相奎, 等. 兰州市少数民族流迁人口空间行为特征及动力机制. 地理科学进展, 2010, 29(6): 716-724.